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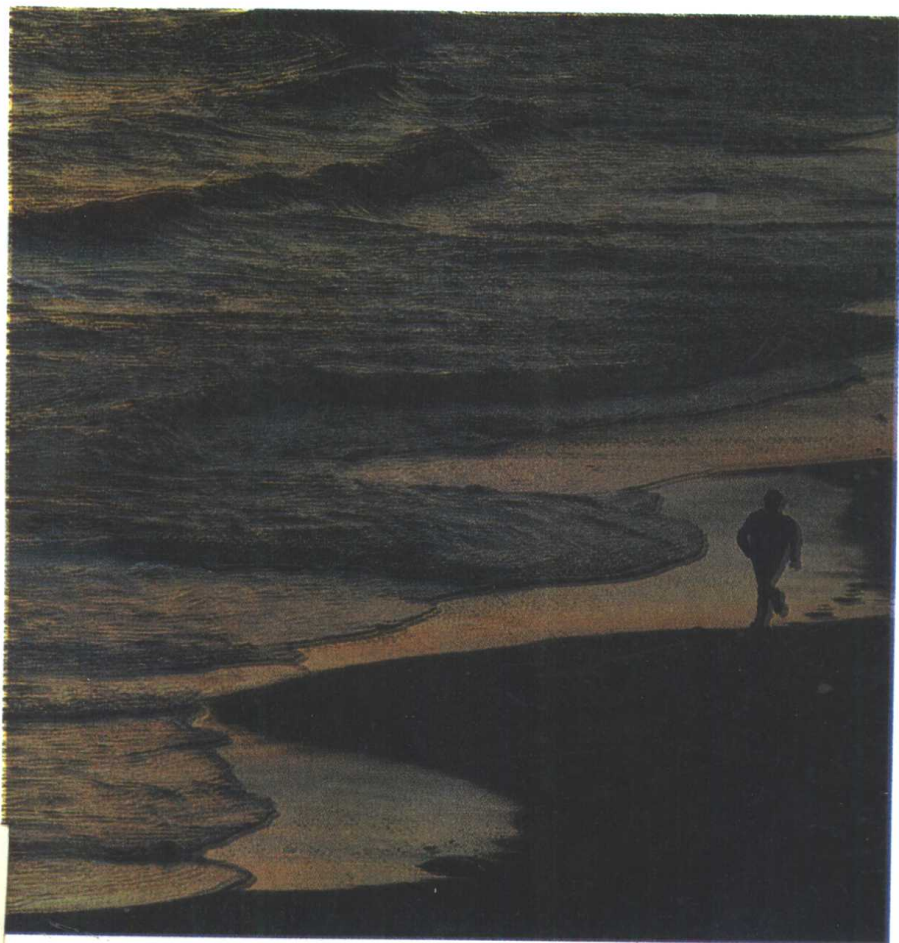


0033880

人生透视



金汕著



 华龄出版社

人 生 透 视

金 汕 著

华 龄 出 版 社

1991 · 北京

(京)新登字068号

人 生 透 视

金 灿 著

出版发行：华 龄 出 版 社
(北京西黄城根北街11号)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安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9.375印张 183千字

1991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
第1次印刷

印 数：1—10100

ISBN 7—80082—154—4/I·66

定 价：4.35元

写在前面

几年来写了点报告文学，大多是刊物约稿后匆匆赶出的急就章。我原本没有把它们凑集成书的愿望，我想摆脱这种仓促后坐下来写点有份量的东西再说，否则有点对不起读者。但我终于变得迫不及待了，原因很简单，就是连这些不成熟的东西也屡屡被宰割，以本集的内容而言，几乎全都未能幸免：《往事堪回首》被北方一文摘刊物转载，连作者名字都被删去；《容国团之死》被南方一体育刊物一字不差地转载，我的名字竟被换成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傅其芳、姜永宁之死》被收入一本书中，主编告诉我稿费已寄原出版社转作者，原出版社竟一分钱也不付我；《溥仪热》及《我的前半生》版权之争》被一本很赚钱的书《名人的官司》收入，我是在街头的书摊上才发现的。还有未收进本集的三年多前写的《遇外婚姻在爆炸》被多处转载，也是分文没有，更有个别作者大量引用文中事例，却给当事人改了姓名……

说句实话，如果我为这些事去打官司，我什么事情也别干了，可总不能这样“坐以待毙”吧？那么，就把我这些只配扔到纸篓里的东西重新检出来，与其让他们捞稿费，还不如我捞稿费，这毕竟是属于我自己的。我的“抵抗”是很消极的，但多少能得到点心理上的平衡。

在此，我十分感谢为书中几个有关大案文章提供了许多真实情况的北京市纪委办公室主任梁湘汉同志，感谢帮助和支持过我的各位朋友，愿他们分享我这物归原主后而自得其乐的快活。

金 汕

1991.6

目 录

归来的人们

——五十年代回国的优秀人才…………… (1)

艺术的倒挂…………… (24)

中国球迷现象…………… (35)

求索者之歌

——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自述…………… (65)

珍品哟，愿你失而复得

——张大千前妻杨宛君叙述的故事…………… (91)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乒坛三杰之死…………… (117)

往事堪回首

——鲍蕙荞谈庄则栋…………… (142)

末代皇姑话今昔…………… (178)

讲真话的人

——记黄秋耘…………… (189)

体育转播第一人

——记张之…………… (199)

成名作：他使死罪犯获得新生

——记青年律师巩沙…………… (207)

十二万里丝路行

——与一对画家夫妇的对话·····	(215)
“溥仪热”及《我的前半生》版权之争·····	(222)
一位高级干部的忏悔	
——马学亮案的启示·····	(256)
一个超级“学术”骗子的自述·····	(280)

归来的人们

——五十年代回国的优秀人才

日本明治维新后，一批去欧洲留学的日本学生在回国时遇到了麻烦——所在国当局不允许他们带走任何资料。一位日本青年对同伴说：“我准备自杀，死后给我剖腹，把资料连同我的遗体运回日本。”他果真这样做了。在今天日本人的眼中，这仍然是气壮山河的举动。

在中国，我们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岁月里，在海外的成千上万个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抛弃了优厚的待遇，顶住了重重的压力，远涉重洋回到祖国，几十年时间过去，他们不仅向自己的民族奉献了毕生的心血，而且很多都有过令人潸然泪下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所走的道路比那位日本留学生更为艰难、悲壮……

当人们对80年代兴起在中国大地上的出国热做出各式各样的评价时，当多少人为了一张签证绞尽脑汁、四处奔波的时候，当那些离开国土时或带着庄重使命感、或忧喜

参半、或高兴得认为终于到了一片自由的圣土时，人们是否还记得30多年前的那一次归国热？

一艘艘从大洋彼岸开来的轮船，载着一位又一位归心似箭的海外游子。他们在茫茫无边的大洋中，随着被旋卷风暴腾空抛起的轮船，心中无不震荡着一个令他们自己也为之震颤的声音：祖国，我回来了！

回来了，两鬓已经出现白发的李四光先生，他从一条法国货轮上走下来，又辗转从香港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四楼，他推开西窗，在首都西麓象苍翠屏障绵延着的燕山皱褶，正阳门、崇文门的城楼和古老城墙上升起的天坛圆顶，使老人的眼睛湿润了。正是这位堪称“地质之光”的李四光先生，创立了被世界公认的学派。也正是这位睿智的科学巨人宣告中国的浅海、平原、盆地蕴藏着丰富的天然石油和天然气。他那充满着科学精神的考证廓清了中国人心头贫油的自卑感。大庆油田发现时正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刻，如果没有李四光先生的归来，这一进展必定要延缓，这对整个国家将意味着什么？

回来了，英姿勃发的学者钱学森先生，还有与钱学森并称“三钱”的钱伟长、钱三强。也有刚刚26岁的翩翩青年邓稼先以及朱光亚、吴仲华、郭永怀……这些科学家在世界任何发达国家都有他们的地位，但他们毫不犹豫地归来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尽管我们同一些国家已经“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但我们毕竟遭受过核武器的威胁。我们归来的杰出的科学家，改变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

回来了，中国文坛的巨匠老舍，他在美国已经负有盛名，《骆驼祥子》是美国的畅销书，《四世同堂》被称为美国自二次大战以来出版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这位酷爱自己故土的大师说：“我一天也呆不下去，我是地道的受洋罪，象是丧家之犬。”他匆匆赶回北京参加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文代会。

回来了，中国数学界的骄傲华罗庚，中国现代建筑学界的泰斗梁思成乃至各个领域中的尖端人才……

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从某种程度讲，中国的希望既在于自己，也在于世界；中国的现代化既要靠生生不已的中国人，也要靠世界的激励。现代化的进程常常是极艰难的，尤其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文化机制和文化背景。而这些接受了先进文化的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要求最迫切、最内行，但他们身上又流着传统文化的血液，这种灵魂深处的自我冲突和两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使他们必然要忍受心灵甚至肉体上的痛苦——“不似怀人不似悼，梦回清泪一潸然”——他们本来不该有这样的经历，但中国的历史进程使他们无法避免这一步。

**梁思成——中国最出色的建筑
学家和具有双重文化修养的学者，
却在建筑领域里走进了处处遇到诘
难的迷宫……**

“北平保不住了，共产党来了，还是留在美国吧。”

1948年，对正在美国讲学的梁思成来说，面临着后半生两种迥然不同的抉择：他可以留在美国，以一位名教授的身份从事自己的设计和研究，过着极为优裕的生活；他也可以回中国这个属于自己的贫穷落后和百废待兴的故土。

梁思成异常自信地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相信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回去为中国的建设出力吧！”他的夫人林徽因说得更为动情：“我们不能做中国的‘白俄’！”

梁思成教授固然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但“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的群体至上文化，也是同样不可忽视的因素。而我们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年头，又恰恰是亘古少有的盛世，这也使他内心的使命感更显得崇高了。他殚思竭虑地设计和总结着中国式的建筑，规划着皇皇古都北京的建设，天安门广场上辉宏磅礴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只是他许多传世之作中的一个。他以一个青年人都少有的激情从事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育工作，中南海怀仁堂的整修设计和国徽设计图案也是在这位系主任主持下完成的。他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这位纯粹的书生并不懂得党章，他把申请书交给了毛泽东主席，而且真的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按说，一位兼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与高级知识分子于一身的人一定会舒畅自如地从事自己心爱的事业，但中国自然经济的格局、“人治”传统的强化和对外文化的封闭，使梁思成这样的人走进了一个处处走不通、处处遇到诘难的迷宫。

那还是在50年代初，他作为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副

主任陪北京市的负责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位负责同志对梁思成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是烟囱。”

中国工业的落后，使它吃够了苦头，对它寄予期望固然令人振奋，但在天安门前处处见到烟囱，却令梁思成忧心忡忡！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曾说，梁思成是他结识的人中最有双重文化修养的，他在欧美进行过深入地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但这给他带来的只是徘徊于两种文化时无所适从的困惑。此刻，他庄重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北京是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象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幽美，一片新绿，而大批名胜古迹足可以发展成吸引外国人的旅游城市。”

这位当之无愧的建筑大师在政治上单纯得近乎幼稚，他觉得自己的论点也是源于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过“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那么我们就应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华盛顿是成功的典型，为什么不能学呢？而工业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污染、复杂的交通问题和居住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预防呢？他忘记了，关于资本主义是“日薄西山”的许多教导，忘记了华盛顿是“纸老虎”的象征，也没有看透整个国家在走向文化大封闭的总趋势。

深厚的学识和在文学、音乐、绘画、雕塑乃至古典装饰等多方面的修养，使他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理论方面独树一帜，高人一筹。他50年代初期就提出建筑是社会科学、

技术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不能因为科技的发展去否定建筑艺术，他的“大屋顶”便是对民族形式建筑的一种探索。但在1955年4月，却开始了对“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的批判”。北京市成立了“批梁”办公室，各种以运动方式来处理学术问题的做法，竟这样早地降临到他头上。

一位建筑学界的尖端人才成为众矢之的，这已非个人的不幸了。他终于做了检查，从承认“大屋顶造价昂贵”的前提下承担了责任。后人又有什么理由怪罪他的软弱呢？

对梁思成来说，更大的苦恼还不在个人的遭遇，而恰恰是他无力挽救他挚爱的民族瑰宝。这也就是传说中的他受到批判没有掉一滴泪，而听说北京的城墙将拆毁而禁不住痛哭。

早在40年代，世界著名的城市规划学家丹麦人罗斯穆森曾登上北京古老的城墙，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北京，古老中国的都城，可曾有过一个完整的城市规筑的先例，比它更庄严、更辉煌的么？”

“整个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北京城无可比拟的魅力，便是它集历代都城建筑艺术之大成和在规划设计上的整体性。梁思成有一个美妙的设想，对北京城的改造绝不能轻举妄动，对于城墙，可以利用它与护城河扩建为环城的公园，在这个环城公园之外，

更扩建新市区。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独特风貌能够保留下来，还可以美化环境，调节城市的小气候。今天的中国人一定会说，梁先生的规划得以实现，该是件多么庆幸的事！可当时，他的科学结论也只能同马寅初的人口论一样被丢弃一旁。

即使是“螳臂挡车”，他也要挡一挡。他在有关会议上慷慨陈词，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文质彬彬的瘦弱学者会这样激动，他说：“中国建筑是延续了两千年的工程技术，本身已造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北京是历史留下的杰作，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认为北京市就不能动了。但首先要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规划……”

同样一些学者与梁思成一起据理力争，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也说：“我国有一条万里长城，被公认为世界奇观之一。北京的城墙和城门，同样是工程宏伟的古建筑，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力……”

但学者们的言之凿凿的论据竟是那样不堪一击，只要把“封建复古”“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这样的深渊摆在他们面前，谁还敢越雷池一步？

人类的一份辉煌的遗产，就这样一点点地毁弃了。

他那尚未苍老的眼睛，也滚下一串串酸楚的泪，在那已经模糊的视觉里，他仿佛看到了什么呢？

那是1948年隆冬，一位解放军指挥员来清华园找到他，和蔼而亲切地说：“教授先生，解放军随时可以打下北平，为了保护古都文化，请您在地图上标出所有的重要古

建筑，解放军宁可多流血牺牲，也要换取古城的安全。”

梁思成对这支革命军队的感情，正是从这个时刻开始的。

仅仅几年，为什么要拆掉一个古城的屏障和界标呢？

他想起与妻子林徽因到郊外游玩，曾面对城墙写下了抒情诗般的语言：“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没有了古城墙，北京这支古老的歌还有那么动人吗？

.....

正是在这种担忧、焦虑、痛苦伴着偶尔兴奋的心态中，他又迎来了让他惊惶得不知所措的“文革”。

所有的恶谥和罪名向这位中外闻名的学者头上扣来。

梁思成晚年的心境是极为矛盾的，他后悔学了建筑学，但他实在不知道错在何处，并预言让他重学建筑，他仍要犯这个错误。这并不影响他真诚地认罪、悔过，他幻想只要教育革命成功，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他宁愿被革命人民“踩在脚下，并踏上亿万只脚”。他离开人世前，最大的愿望也只是有人与他一起讨论教育革命，并能心平气和地告诉他错在何处。直到1972年他在凄寂与孤独中去世。

侯仁之——一位“考验”了30
年才入党的著名学者，虽年近八旬
却仍然不愿放慢自己的脚步.....

一级、二级.....他停下来急促地喘了几口气。40℃气温使鄱阳湖畔变得象令人窒息的蒸笼。在烈日下，身上

120斤重的砖把他的脊背压弯了，他咬紧牙关，砖上的棱角狠命地扣向他背上。每一级台级都要滴下他的汗水，汗水在石头上顷刻间变成蒸气又留下一个个小白圈。啊，抬头望去，还有40多级，5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都眼晕。不能摔倒，不能停歇，摔倒就意味着抗拒，停歇就意味着复辟。这荒诞的岁月啊！

复辟？真向往资本主义，用不着复辟。40年代，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就担任了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台湾方面做了大量和周密工作，千方百计阻止这些留学生回大陆。他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在地下党的指导下动员了一批同学回祖国效力。

他就是中外闻名的教授、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侯仁之。任何一个与他接触过的人，都会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透过他镜片后睿智的目光，你会发觉他的渊博和机敏。他那笔直的腰板、壮实的身躯和轻盈的脚步，分明告诉你他是个旅行家、探险者。他富有煽动性的讲话，曾打动了多少学生的心，在莽莽的荒原，在崇山峻岭中，在洪流滚滚的大河旁，他多少次用抒情诗般的言语讴歌大好河山，激励青年们用双手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多少学生对这回荡在大自然的声音都有“心中藏之，何日忘之”的感受。

他的真诚和贡献，没有任何怀疑的理由。但从欧美回来的学者，首先要因耳濡目染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方式，受过资产阶级的系统教育而接受长期的思想改造。他们很难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沉重的帽子，他们

最高的愿望也不过是想做附在无产阶级这张“皮”上的“毛”。他回国后便梦寐以求入党，一直受到没完没了的考验，他这样的学者远比不上不知马克思为何国人、斗大的字认识不了半升的文盲好入。他没有丝毫的不满和沮丧，心甘情愿地继续接受考验，直到“文化大革命”被打成黑帮、发配到鄱阳湖畔劳动改造……

历经几年难以想象的改造回到北京，老教授第一件事便是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再一次提出申请。直到进入80年代，年已古稀的侯仁之才实现了30年的梦想。当侯仁之作为访问学者再一次到西方，世界变化之快给他极大的震动。而颇有戏剧意义的是，梁思成和他极力保护的城墙虽然不复存在，但并不知道这件事的美国匹兹堡大学校长却以一种特殊的举动为古城砖的价值做了结论。

那是在这所大学的巍峨大厦里，该校正在接受侯仁之代表北京大学赠送的礼品，这个礼品就是当年城墙上多少亿块扔掉的城砖中的两块。上千双眼睛都盯着这奇异笨重的礼物。当他们知道这两块砖竟比美国诞生还要早200年时，整个大厅里爆发出惊讶、赞叹和经久不息的掌声。匹兹堡大学校长博斯沃教授深情地赞美道：“这两块和美国历史同样古老的城砖，正是我们两个大学之间持久的文化联系和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他们为每块砖制作了红木盒子，盒子的价值竟是500美元。

侯仁之更感到了事情的紧迫，由于历史的条件，已失去的不再归来，但让子孙万代痛惜的蠢事不能再干了。为了北京城的发展规划，他要进行一次详尽的论证。当年梁思